

# 大家小书

## 国学救亡讲演录

章太炎 著 岑木 编



国学救亡讲演录

章太炎 著 蒙木 编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学救亡讲演录 / 章太炎著 ; 蒙木编. — 北京 :  
北京出版社, 2018. 8

(大家小书)

ISBN 978 - 7 - 200 - 14045 - 3

I. ①国… II. ①章… ②蒙… III. ①国学—研究  
IV. ①Z1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72011 号

总策划 安东 高立志  
责任编辑 高立志 邓雪梅

· 大家小书 ·

国学救亡讲演录

GUOXUE JIUWANG JIANGYANLU

章太炎 著 蒙木 编

\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 
北京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www. bph. com. cn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\*

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 8. 125 印张 134 千字

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0 - 14045 - 3

定价: 38. 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

此为试读, 请尊重版权, 禁止非法传播。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 : www. ertongbook. com

大家小书

# 总 序

袁行霈

“大家小书”，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。此所谓“大家”，包括两方面的含义：一、书的作者是大家；二、书是写给大家看的，是大家的读物。所谓“小书”者，只是就其篇幅而言，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。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，有些倒是相当重。其实，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，一部书十万字，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，似乎算小书，若在老子、孔子的时代，又何尝就小呢？

编辑这套丛书，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，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补习，遂成为经常的需要。如果不善于补习，东抓一把，西抓一把，今天补这，明天补那，效果未必很好。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，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。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，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

地体味，也花不了多少时间，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。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，剂量小，吃起来方便，消化起来也容易。

我们还有一个用意，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。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、读者认同的著作，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，使之不至于泯没。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，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；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，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。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，让它们重现光芒。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，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，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。人文科学则不然，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。然而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，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，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。

“大家小书”的开本不大，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。在路边等人的时候，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，在车上、在公园里，都可以读。这样的读者多了，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，岂不是一件好事吗？

“大家小书”出版在即，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。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，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。该说的都说了，就此搁笔吧。

# 用国粹激动种性，增进爱国的热肠

——晚年以国学救亡的章太炎

蒙 木

国学，常常指“一国固有之学问”，但国学这个词本身属于舶来品。

明治维新后，日本国力趋盛，很多人开始讨论大和民族的特性是什么？因此日本出现了西化派和国粹派的论争。黄遵宪（1848—1905）于1887年刊行的《日本国志》最早记录了这个论争，并开始使用“国学”这个词。中日甲午战争之后，马关之耻震醒了不少中国士人，他们开始向日本学习。国粹和国学这些词越来越多地走到中国维新人士的笔端。尤其是戊戌维新失败后流亡日本的那些士人亲身感受了这场论争。梁启超（1873—1929）在1902年致函黄遵宪，拟倡办《国学报》，而黄遵宪认为传统旧学“尊大”“固弊”，须先大开门户，容纳新学，“俟新学盛行，以中国固有之学，互相比

较，互相竞争，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，真道理乃益明”。国学的提倡“略迟数年再议，未谓不可”。但他充分肯定梁启超所拟《国学报》纲目体大思精，不如先据此写一本《国学史》。“养成国民，当以保国粹为主义，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。”在梁启超这里，国学是一个“新民”的过程。他1902到1904年连载的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中数次提到“国学”这个词。

1903年2月，黄节在梁启超主编的《新民丛报》第26号发表《游学生与国学》，希望“以公众之力，设置一国学图书馆”，“图书馆若成，则凡是有志于是者，可以开一国学研究会，以世界之新知识，合并于祖国之旧知识，十年之后，我国学之光焰，必有辉于大地者”。

1904年3月《政艺通报》第三年甲辰第三号上，邓实发表长文《国学保存论》，进一步提出“保存国学”的主张。同年7月《政艺通报》甲辰第十一号上，黄节又发表了《国学报叙》说：“癸卯岁暮同人创为国粹学社，拟月出《国学报》一编。”8月，邓实在简朝亮《国粹学》一文前面加按语，大声疾呼：“呜呼，国学不明，大义终塞，将有国破种亡之惨，学其乌可一日已乎？”

在上海，继出现了国学扶轮社和国学社等出版团体之后两

三年，1905年初，邓实、黄节等人又发起成立革命学术团体“国学保存会”：“爱日以学，读书报国，匹夫之贱，有责焉矣。”筹办《国粹学报》为其机关刊物。同年2月《国粹学报》创刊，序说：“海通以来，泰西学术，输入中邦，震旦文明，不绝一线。无识陋儒，或扬西抑中，视旧籍如苴土。夫天下之理，穷则必通。士生今日，不能籍西学证明中学，而徒炫皙种之长，是犹有良田而不知辟，徒咎年凶；有甘泉而不知疏，徒虞水竭。……惟流俗昏迷，冥行索途，莫为之导，虽美弗彰。不揣固陋，拟刊发报章，用存国学……钩元提要，括垢磨光，以求学术会通之旨，使东土光明，广照大千，神州旧学，不远而复，是则下士区区保种爱国存学之志也。”《国粹学报·例略》表述得更为简明：“发明国学，保存国粹，不有门户之见，不涉党派之私。”《国粹学报》发刊初期，执笔人甚少，主要是邓实、黄节、刘师培。后来撰稿人逐渐增多，陈去病、章太炎、廖平、王国维、郑孝胥、黄侃、柳亚子、罗振玉、马叙伦等陆续加入。

没有西学，谈不上国学。国学是维新士人有鉴于西学强势东渐而提出来的，他们要检点中国固有的家底。最早宣扬国学的这批人有很多都有较强的西学背景，他们提倡国学的初衷不是要研究国学如何博大精深，而是通过国学来刺激爱国心，增强我们海纳西学的文化自信。“有亡国，有亡天下。……易姓

改号，谓之亡国。仁义充塞，而至于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，谓之亡天下。……保天下，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。”这个命题是当时国学人士有强烈共鸣的。国学在，天下就不会亡。这个思想延续到后来，章太炎1907年发表的《中华民族解》将“中国民族”定义为文化概念：“中华之名词，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，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，乃为一文化之族名。”

谈国学绕不开梁启超，也绕不开长他四岁的章太炎（1869—1936）。章太炎在《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》中说：“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，不可像卖古玩一样，一时许多客人来看，就贵到非常贵；一时没有客人来看，就贱到半文不值，自国的人，该讲自国的学问，施自国的教育，像水火柴米一个样儿，贵也是要用，贱也是要用，只问要用，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。后来水越治越清，火越治越明，柴越治越燥，米越治越熟，这样就是教育的成效了。”

1906年6月，苏报案“主犯”章太炎出狱，中国同盟会派员迎其赴日。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，述“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”，认为最紧要的是：“第一，是用宗教发起信心，增进国民的道德；第二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，增进爱国的热肠。”“提倡国粹”，“不是要人尊信孔教，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”，即其“语言文字”“典章制度”

与“人物事迹”。1906年9月5日，章太炎主笔的《民报》第七号刊载了《国学讲习会序》，说：同人拟创设国学讲习会，章炳麟先已允为宣讲者：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，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，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……其实这个讲习会第一次开讲一直迁延到1908年4月4日。国学讲习会在大成学校的大班课听者甚众。后来鲁迅等留学生闻名进来，发现脱课不少，想从头听讲，便托人央章先生另开一个小班。7月11日开始，章太炎在民报社寓所小班开讲，听讲人包括钱玄同、马裕藻、沈兼士、朱希祖、周豫才（鲁迅）、周启明（周作人）、许寿裳等。周作人说：“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，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，随便谈笑，同家人朋友一般。夏天盘膝坐在席上，光着膀子，只穿一件长背心，留着一点泥鳅胡须，笑嘻嘻的讲书，庄谐杂出，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哈喇菩萨。”

据刘文典回忆：“有一天下午，章先生正在拿佛学印证《庄子》，忽然听见巷子里卖号外。有一位同学买来一看，正是武昌起义的消息，大家喜欢得直跳起来。从那天起，先生学生天天聚会，但是不再谈《说文》《庄子》，只谈怎样革命了。”黄侃对这次东京讲学回忆说：“其授人国学也，以谓国不幸衰亡，学术不绝，民犹有所观感，庶几收硕果之效，有复阳之望。故勤勤恳恳，不惮其劳，弟子至数百人。”

这是章太炎第一次集中而系统地讲学，他第二次系统讲学是在他被袁世凯羁押北京期间，以“国学会”名义“讲学自娱”。“国学会”“专以开通智识，昌大国性为宗。”1913年12月9日首讲，地点在北京化石桥共和党本部，“到者约百人”。这次讲学持续了一个多月，听众中除钱玄同、吴承仕、马裕藻外，还有毛子水、顾颉刚、傅斯年等青年学生。据顾颉刚回忆，“讲学次序，星期一至三讲文学科的小学，星期四讲文科的文学，星期五讲史科，星期六讲玄科。”吴承仕时任司法部佥事，因倾羨章太炎的道德文章，常来请教佛学方面的问题，令太炎大喜。《蕤汉微言》便由章太炎讲授，吴承仕笔录，于1916年初完成的。

1916年12月26日，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。蔡元培和章太炎是浙江同乡，从爱国学社便开始合作革命，后来同为光复会的发起人、同盟会的元老成员。蔡元培主政的北大，其文科骨干主要是章太炎的弟子们：钱玄同、沈兼士、马裕藻、朱希祖、沈士远、黄侃、马叙伦、刘文典、周豫才（鲁迅）、周启明（周作人）等，以至于陈源在和鲁迅的论战中说“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实力的某籍某系”，后来沈尹默在《我和北大》一文中也承认了这个某籍某系（浙江籍北大国文系）的存在。

章太炎第三次讲学是1922年4月至6月，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，在上海讲授“国学”。每周一次，每次两小时，一共讲了十讲。同年11月，曹聚仁的讲课记录以《国学概论》为书名由上海泰东书局排印出版。《国学概论》后来成为章著中最为知名与普及的一种，后世对于“国学”的想象，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书框架。

第四次讲学是1934年冬至1936年6月以“章氏国学讲演会”“章氏国学讲习会”等名义进行的。1934年秋，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。最初，在居无定所的情况下举办了每周一次的星期讲演会，1935年9月，在购买了苏州锦帆路50号居所后，又于此开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。据统计，学员年龄最长的七十三岁，最年轻的不过十八岁，籍贯遍及十九省，住宿学会里的百余。这次讲学的最后成果主要是《国学略说》的刊行。

其实，1929年已届花甲之年的章太炎基本上闭门杜客，对国事、学术俱缄默无言，自甘淡出政治和学术舞台了。是“九一八”事变日本的入侵，刺激了章太炎，他才再次走出书斋，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呼吁奔走，与熊希龄、马相伯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，呼吁国民党各派系停止内斗，共同抗击侵略。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不久，他一来为了避难，二来想利用自己民国元勋的身份，以及与北方军阀们的私

交，“代东南民众呼吁出兵”。2月29日，章太炎到达北平，请张学良出兵抗日，“大声疾呼，声震瓦屋”；又见段祺瑞、吴佩孚、冯玉祥等，要求共同御侮。这些人在抗日战争中晚节昭然，与章太炎的游说未必没有关系。

在北平停留约三个月，章太炎先后在燕京大学、北平师范大学、北京大学等作学术演讲。据钱玄同日记，1932年3月22日在民国学院讲《代议制改良之说》；3月24日，章太炎在燕京大学讲《论今日切要之学》；3月28日在中国学院讲《治国学之根本知识》；3月31日，在师范大学讲《清代学术之系统》；4月8日在北京大学讲《揭示学界救国之术》；4月12日，在平民大学讲《今学者之弊》；4月18、20、22日，在北京大学讲《广论语骈枝》。

关于章太炎北大讲学情形，钱穆《师友杂忆》载：“太炎上讲台，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，骈立台侧。一人在旁做翻译，一人在后写黑板。太炎语音微，又皆土音，不能操国语。引经据典，以及人名地名书名，遇疑处，不询之太炎，台上两人对语，或询台侧侍立者。有顷，始译始写。而听者肃然，不出杂声。此一场面亦所少见。翻译者似为钱玄同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（据钱玄同日记，写黑板是魏建功——笔者注）。……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，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。”张中行也有回忆，他说：“地点是北河沿北

京大学第三院风雨操场，就是五四时期囚禁学生的那个地方。我去听，因为是讲世事，谈己见。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，坐满了，不能捷足先登的，只好站在窗外。老人满头白发，穿绸长衫，由弟子马幼渔、钱玄同、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。太炎先生个子不高，双目有神，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。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。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，由刘半农任翻译；常引经据典，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。说话不改老脾气，诙谐而兼怒骂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：‘也应该注意防范，不要赶走了秦桧，迎来石敬瑭啊！’其时是‘九一八’以后不久，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。话虽然以诙谐出之，意思却是沉痛的，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送老人走出去。”

1936年6月14日，章太炎病逝于苏州锦帆路寓所，留下遗言：“设有异族入主中夏，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。”他生前将墓地选在西湖边张苍水墓侧。国民政府褒令国葬，但因抗战烽火，国葬未能实行，家人将他暂葬苏州章家后花园。1955年4月，按照其生前遗愿，章太炎的灵柩得以迁葬于杭州西湖边，南屏山麓，荔枝峰下，紧邻张苍水墓，墓碑上篆隶结合的“章太炎之墓”几个字是章生前自己写就。1966年底，章太炎被掘墓暴尸，墓地辟为菜园，又十五年后才寻回遗骨，恢复陵墓于旧址。章太炎墓之外，1988年又添了章太炎纪念馆。

章太炎讲国学从文字训诂、古籍辨伪等小学讲起，进而经学，进而玄学（哲学—思想史）。因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，章太炎一直特重文学。1910年章太炎精心编定的《国故论衡》“上卷小学十篇，中卷文学七篇，下卷诸子学九篇”，不及史学；到《国学概论》，分为经学、哲学、文学三部，史学是附于经、文之后来讲的。

卞孝萱认为章太炎特重史学，是从1924年开始的。是年7月，他在金陵教育改进社讲《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》，提出：“保存国性，发扬志趣”是教育的根本，“至于能发扬志趣，保存国性之教育，其要点则重在读史”，“无史之国，每易沦亡”，“盖时代愈近者，与今世国民性愈接近，则其激发吾人志趣，亦愈易也”。日本侵华后，1932年3月24日，章太炎在燕京大学讲《论今日切要之学》，认为在亡国灭种关头，历史学可以唤起青年的爱国之心，研究历史最为切要。1933年在无锡国专演讲《历史之重要》：“经术乃是为人之基本，若论运用之法，历史更为重要，处斯乱世，尤当斟酌古今，权衡轻重。”这篇演讲中，他特别强调：“昔人读史，注意一代之兴亡。今人情势有异，目光亦须变换，当注意全国之兴亡，此读史之要义也。”

1934年，章太炎在《与邓之诚论史书》中又说：“鄙人

提倡读史之志，本为忧患而作。”1935年六七月，他连续演讲《论读史之利益》《略论读史之法》强调读史“当论大体”。是年6月6日，章太炎曾作《答张季鸾问政书》：“一、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，即是史书，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。二、为救亡计，应政府与人民各自任之，而皆以提倡民族主义之精神为要。三、中国文化本无宜舍弃者，但用之则有缓急耳。今日宜格外阐扬者，曰以儒兼侠。故鄙人近日独提倡《儒行》一篇。宜暂时搁置者，曰纯粹超人超国之学说。”章太炎调用历史“鼓舞民气，启导方来”，“读史之效，在发扬祖德，巩固国本”，他在《历史之重要》中说：“夫人不读经书，则不知自处之道；不读史书，则无从爱其国家。”

讲经，从来都是章太炎治国学的重点，他在《论读经有利而无弊》中说：“读经之利有二：一、修己；二、治人。治人之道，虽有取舍，而保持国性实为重要。”

“修己治人”是章太炎晚年一再强调的。在他看来，提倡“修己”之学，实为乱世里的救急之术，而非借此修身成德，优入圣域。在《国学之统宗》中，他揭橥《孝经》《大学》《儒行》《丧服》四部经典。“爱国者，爱一国之人民耳。爱国之念，由必爱父母兄弟而起。”所以《孝经》一书，实不可轻。“《大学》者，平天下之原则也。从仁义起，至